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著



旧籍新刊

蔡尚思題



岳麓书社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著



旧籍新刊

蔡尚思题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文正义

封面设计 胡 颖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375

字数:160,000 印数:1—3,000

ISBN7—80520—952—9
K·189 定价:9.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目 录

重印前言	陈旭麓 (1)
------------	---------

中国近代史

小序	(1)
总论	(2)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6)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6)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10)
第三节 东西对打	(12)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16)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18)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20)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23)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28)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28)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31)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34)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36)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40)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40)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43)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45)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50)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57)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67)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67)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70)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73)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77)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81)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86)

外三种

评《清史稿·邦交志》	(91)
琦善与鸦片战争	(104)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125)
小引	(125)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126)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130)
三、尼布楚交涉	(140)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150)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157)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167)

附录

之一、资料评叙·····	(179)
之二、清太祖太宗征服的边境民族考·····	(182)
之三、释“俄罗斯察罕汗”·····	(183)
之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183)
欣慰与回忆·····	蒋寿仁 (1)
出版说明·····	岳麓书社 (1)
重版后记·····	文正义 (1)





重印前言

陈旭麓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到长沙参加左宗棠逝世百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访问了岳麓书社，钟叔河同志谈起他们“旧籍新刊”的计划。这里的“旧籍”一词，大体指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刊行的一些书，是介于古籍与新书之间的著述。我顺便提到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嗣后，钟叔河同志来信要我为“新刊”此书写几句话。

蒋廷黻（一八九五——一九六五），湖南宝庆（今邵东）人。以研究外交史驰名，编过《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著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交史》等，原为清华大学教授，后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所著《中国近代史》，原为《艺文丛书》之一，初版于一九三八年。这是一本薄薄的才五万余字的书，论述却颇能融汇贯通，以作者自己的认识，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点带线，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为近代中国划了个轮廓。它曾在知识界中流行，后因其政治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遭到非议，然而识者仍以这本小书不无可取之处。

这本近代史用对比的方法入手，一开头就抓住中国社会的差

距说话，指出“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因为：“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说那时的军队、政府是“中古”的，人们不会有异议；中华民族诚然是勤劳勇敢的，但就那时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状态来说，也是“中古的人民”，并非失言。我们对近代社会的各种关系，既要进行具体的研究，也应有全局的探索。

中国如何从“中古”的状态解脱出来，蒋廷黻继而在书中作了这样的论证：“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要向西洋人学习，改变中国过时了的事物，这是从林则徐以来逐步认识的道理，开始从科学技术着眼，然后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社会改革，由此而有“近代化”的总体上的要求和呼唤。蒋廷黻说洋务派“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一步之后，就发现必须更进一步；再进一步，又必须再进一步”。洋务派虽然由军事工业而民用工业以至教育文化上的设施，其实远没有这样的完整认识，这个认识过程是在洋务运动后数十年才达到的。但是，要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逻辑。蒋廷黻在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这个逻辑，所以也就能触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总要求。

近代化对中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

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个话颇有分量。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之路呢？蒋廷黻的回答说：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阶级饭碗的摇动。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是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是少数看得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而不言。”这些情况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充分暴露了出来，上推至鸦片战后的五十年代即已呈现，刚萌芽的维新思想一开始就受到窒息。不过蒋廷黻说的虽有少数人看得较远较清却怕清议指摘而不言，这不是全部。事实上也曾有过敢言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郭嵩焘者，洋务运动中有，维新运动中多了些，如果戊戌的激荡发之于鸦片战争结束的岁月，则后来的历史或有所不同。

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环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某些实况及其方向的。但是，他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也没有从这些认识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并不足怪。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书中慎重地考虑了应该考虑的问题，表述了“复兴民族”的愿望。

书中也有“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不从字面上推求，所谓“西化”实际即指近代化，“全盘西化”是更大程度地要求近代化。同时，也是对那种“半新半旧”的折衷言论而发。其他如“捻

匪”一类不当用语，则是蒋廷黻一辈学人的惯性表现，不一一列举。

蒋廷黻专长外交史，有较丰富的国际知识，对近代许多事变的国际背景作了明确的交代，如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引出的一幕幕险恶交涉，都能以简明的文字指出其中的错综关系，了解这些关系，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条件。书中引用不太多的史料和掌故，也给人以形象感，不难看出作者的识力和撰述手法。

我想，重印这本书，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和了解前此一些代表性论著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会没有帮助。

因为《旧籍新刊》的凡例是“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词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只有原书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

中国近代史

小 序^{*}

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是民国二十七年五、六两月起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 据台湾启明书局印行《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九四九年七月台北出版）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

* 以下据“艺文丛书”《中国近代史》（民国二十七年艺文研究会出版）

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象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势很象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势很象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全是隋、唐以来从中国学去的。近四十餘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